

瓦楞上的青草

晋军崛起文学档案

晋军崛起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学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反映地域文学创作实绩、特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关键词，也是山西文学创作界继山药蛋派之后又一次全国性、规模化的展示。直到如今，这些作家依然活跃于中国文坛，是山西文艺创作的中坚力量。

吕新
◎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瓦楞上的青草

吕新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楞上的青草 / 吕新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5
(晋军崛起文学档案)

ISBN 978-7-5378-4703-2

I. ①瓦… II. ①吕…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5865 号

书 名 瓦楞上的青草
著 者 吕 新
责任编辑 贾江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15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703-2
定 价 49.80元

总策划

胡苏平

策 划

李高山 杜学文 刘英魁 梁宝印

编委会

主 任：杜学文

副主任：杨占平 续小强

成 员：李骏虎 孟绍勇 鲁顺民 黄 风 王保忠
王 姝 李金山 潘培江 陈克海 吕轶芳

出版项目部

主 任：续小强

成 员：马 峻 贾江涛(项目负责人)

陈学清 孙 茜 王朝军 刘文飞 庞咏平

韩玉峰 左树涛 谢 放 关志英 王宜青

张 丽 范 戈 畅 浩 曹雨一

出版说明

晋军崛起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反映地域创作实绩、特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关键词。“晋军”所指,是以成一、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王东满、柯云路、李锐、张平、钟道新、燕治国、哲夫、蒋韵、赵瑜、王祥夫、吕新等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晋军崛起,是山西文学创作界继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之后又一次群体性、规模化的展示。他们继承了山药蛋派作家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表达了丰厚的中国文学经验,标志着山西当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贡献。直至今日,他们依然活跃于中国文坛。

《山药蛋派经典文库》出版后,山西省委宣传部决定继续策划、组织编辑出版《晋军崛起文学档案》,系统梳理晋军崛起时期(1979—1989)的文学收获和有关资料,对总结文学创作经验,传播当代文学经典,彰显中国文学精神,促进文学繁荣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

本丛书只收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出来的被称为晋军崛起时期代表作家公开出版、发表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分别为:成一的《游戏》《顶凌下种》,周宗奇的《新麦》,张石山的《锻柄韩宝山》,韩石山的《女儿的嫁妆》,王东满的《柳大翠一家的故事》,柯云路的《新星》《三千万》,李锐的《厚土》,张平的《法撼汾西》《姐姐》,钟道新的《超导》,燕治国

的《小城》，哲夫的《长牙齿的土地》，蒋韵的《我的两个女儿》，赵瑜的《强国梦》，王祥夫的《拾掇那些日子》，吕新的《瓦楞上的青草》共十八种。此外，本丛书编选了一集《“晋军崛起”论》，意在进一步深化对晋军崛起作家的学术研究。

为保持作品历史原貌，除对一些明显错讹和不合出版规范处进行更正之外，其余均尊重原文，不作修正。尽管我们已经做最大努力，但难免仍有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年4月

中国文学的重要一翼

——写在《晋军崛起文学档案》出版之际

◇ 杜学文

20世纪80年代注定是一个令人怀想的年代。那一时期,中国,又一次迈开了崭新的步伐,人民充满了期待。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抱负,在人们的憧憬与努力中绽放。在这个充满了激情与希望的时代,谁也无法预料,中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革,并将如何影响世界,影响人类。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些岁月,不禁感慨万千。我们有幸经历了那个时代,有幸用自己的劳动、智慧融入了那个时代。80年代,是我们生命之花绽放的时代!而我们的文学,不仅被那个时代所孕育,更深深地影响了那个时代。可以说,那同样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有许多文学期刊复刊、创刊——单月的、双月的,理论评论的、原创选载的,等等;有许多作品产生轰动,——以至于人们要讨论“轰动效应”;有人一夜成名万众瞩目——因为一篇小说,或者一首诗。众多的流派涌现出来,不同的观点在争鸣,更重要的是,人们似乎极度热衷于讨论有关文学的话题——这些话题无涉名利、地位、收入与学历。文学,呈现出一种激情澎湃、百花争艳的动人景象。

1985年,《当代》第二期集中刊发了山西四位作家的小说,并在《编者

的话》中指出,“本期刊载的中篇小说,均出自山西省的中青年作家之手。近几年‘晋军’的崛起,引人注目”。于是乎一夜之间,晋军崛起突然成为中国文坛十分耀眼的现象,甚至引发了用“什么什么军”来讨论地域文学的热潮。

这并不是偶然。

被《当代》集中介绍的这批作家,就是晋军崛起时期一部分代表作家。如果说广义的文学“晋军”,那肯定是指山西的作家群。它是不分年龄、体裁、时代的。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晋军”,是特指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登上中国文坛,并被广为关注的山西作家群。他们是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段,以群体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坛的。这批晋军作家大多在三十岁左右,基本来自基层,或者在农村插队,或者在工厂做工,或者在基层机关工作,或者在哪个偏远的山村任教。总之,他们几乎都不在文化单位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属于“外来者”,因为某种原因从北京或者什么大城市来到了山西。大多数人则是山西本地出生,然后几经周折,最终走上了文学之路。从个人的成长来看,他们多有过比较复杂的经历,可以说较为深刻地体验了中国社会,特别是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底层生活,对民众的日常行为、精神特质、价值取向、语言习惯、伦理关系等有着极其细致入微的认知与感受,甚至还有某种程度上的认可与同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中,他们逐渐从生活的“局外人”转变为生活的思考者,并焕发出强烈的表达欲望。也许,他们生来就是要与文学为伴的,就是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生命价值的。在那些文化匮乏、媒体稀少的日子里,他们内心对生命意义,对民族命运,对国家未来的思考与探求从未停止。他们并不安分。不安于自己的生活处境,因而具有了改变现状的强烈期盼;不安于中国的现状,因而具有了强烈的家国情怀;不安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因而企图用文学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于是,尽管这些人分布在表里山河之地的东南西北、沟川塬峁,却不约而

同地拿起了笔。他们不是被动的生存者,而是主动的生活者。他们生活着,思考着,并且表达着。

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人开始登上文坛。尽管出现的时间节点不同,产生重要影响的前后不同,创作的风格及体裁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与时代同步,与国家正在发生着的巨大变革同步。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几乎是在相近的时间里比较突出地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为这个民族所经历的艰难抉择,及其之后的奋起勾画出历史性图像。

在这批人身上,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对他们的深刻熏染。很难说他们接受过比较好的学校教育。他们对自己民族的了解、认知更主要地来自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经历。一方面是他们的家庭,比如一些人出生于大都市,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辈正是比较好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代,对他们的成长,以及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作用。还有一些人则是本地农家出身。恰恰是农村与农民由于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故而保留了比较完整与典型的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核。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经历。这批作家绝大部分在农村生活过。中国农民,或者也可以说,在中国农民身上表现出来的比较典型的中国文化精神对他们有着重要的影响。也许他们不承认,但这一事实不能回避。当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及苏联文学的影响。可以说,他们的文化构成并不是单一的。他们在不自觉中被中国传统文化所熏染,而又在一个开放的、大量译介外来文化的时代被那些新涌进国内的文化观念所影响。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可以说比较好地把“内”与“外”、“传统”与“现代”融合了起来。他们用中国人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时代、人生,并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外来文学中的表达手法,用以描写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人与事。最终,他们超越了本土故事,使自己的创作达到了追求人类永恒意义的审美高度。

从他们最初步入文坛的那些作品来看,有一个突出特点是赵树理及山药蛋派对他们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在最初的阶段,他们对山药蛋派有着非常明显的追随。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把自己归入某个流派。这或许与他们在开始创作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身处山西,信息闭塞,人们所尊崇的自然是与自己最近的那些文化因子。更何况,赵树理等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他们尊崇赵树理等的创作思想,学习赵树理等的创作方法可谓近水楼台。甚至可以说,他们早期的作品均可归入山药蛋派。但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这批作家的创作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分化。尽管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认为这批作家在精神气质上与赵树理等人是一脉相承的。如他们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对人民的热爱,以及重视文学的社会责任等等;但是,在表现手法、文学的终极追求,乃至题材选择等诸多方面,他们开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我们已经不能用某种风格、流派、模式来讨论他们的创作,只能认为他们是山西这块土地上在比较集中的时间内涌现出来的一批作家。他们是文学世界里的“这一个”,具有突出的个人风格。就山西的当代文学而言,这种分化与多元意义重大:它使山西的文学创作从此步入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需要强调的另一个特点是,崛起的晋军是一批创作力十分旺盛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明显不同于我们熟知的许多人,在某一时期产生重大影响之后,就再难写出让人关注的作品,很多人甚至不再创作,只是以“作家”的名义存在着。而这一批作家则不然,他们的创作一直没有停止。直到今天,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之后,他们仍然激情不衰,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不减反增。如果从一个群体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个人的角度看,这简直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

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晋军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什么?

首先,他们用文学表达或预判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作家的意义

不仅在于表现现实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应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要求。这种要求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一厢情愿,它是基于现实生活的,是来自于人民愿望的。晋军早期的小说描写了许多“小人物”,但是,这些小人物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草根地位就表现出单纯的社会地位的边缘性、生命意义的卑微性。晋军作家感受到了来自这些普通人物内心世界对社会发展进步、公平正义的期盼,表达了他们特定社会身份的行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就是“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开始。这对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言,极为重要,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历史并不仅仅是由偶然组成的。在某一事件之中,一定具有强大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蕴含在社会的组成元素——人民之中。晋军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必然性。虽然就他们中的某一作家而言,并不一定是自觉的,但即使是不自觉的,也非常突出地显现出晋军作家的艺术敏锐性及其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如果晋军作家仅仅是在他们的创作中揭示出中国即将出现的伟大变革,也完全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地位,但事实是,他们并没有局限于此。

其次,他们表现了中国人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文化意义。所谓“历史价值”即是说,他们并不仅仅表现中国人在某一时期之内的生活,而是从某一点切入,力图展示具有历史概括性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数千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选择、文化形态。这就使他们的创作具有了一种超越具体人事、时空的品格。他们是为中国的“这一刻”而生的,但又绝不仅仅局限于此。他们脚踏着坚实深厚的土地,心却向往着广袤深远的星空。即使是对“过去”生活的描写,也一定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即使是描写了普通人的生活,也一定表现了普通人所具有的历史的必然性与文化的典型性。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强烈地,但又是隐蔽地潜伏着一种文学的责任。他们努力体现出作家——知识分子,这个已经被时光销蚀得带有贬义的词——本来

应该承担的社会文化责任。

再次,他们表现出对中国现代汉语及文体的自觉探索。如果说,在创作之初,他们在语言表达及作品的文体等方面还具有比较明显的一致性的话,那么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的创作开始了分化。这种分化首先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其次也表现在个人语言的运用上,进而也表现在对作品文体的自觉探索上。尽管大部分晋军作家是从写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开始的,但之后立即发生了变化。现实中的农村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这些作家除了汲取赵树理等前辈作家的语言经验外,非常努力地开始探索属于个人的语言样式。他们似乎要以群体性的努力来丰富现代汉语所能够具有的表现力,或强调汉语的诗性,以优雅的叙述来表现现代汉语的高贵品质;或突出汉语的凝练简洁,以及由此而来的表现张力;或展示源于民间的语言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使得现代汉语活色生香、光彩照人,富于形象感和人性意味的魅力;或强化语言黄钟大吕式的豪迈气魄;或突出语言的调侃、幽默等等。由语言出发,这一批作家在文体构成方面也发生了分化,有的强调叙述的精彩,力求为读者讲述动人心弦的故事;有的强调叙述的非故事性;有的则追求超越具体事件的哲理性、寓言性,或者诗性。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会认为山西作家的创作比较写实,而事实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建立在写实基础之上的“虚幻性”“魔幻性”与“非现实性”。总之,虽然他们具有非常多的一致性,但在语言与文体方面,已不再趋同而极具个性风格。从他们的创作中,我们领略到了20世纪晚期中国文学所具有的可能性与丰富性。

需要描述的另一个事实是,这批晋军作家几乎用自己的创作印证并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几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及现代派文学等。在中国文坛这些非常重要的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中都可以看到晋军作家的努力。

如果就一个人而言,可能不会创作出属于以上“概念”当中的所有类型,但是,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几次比较明显的转型。在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他们就可能会出现一次华丽的转身。如在创作了一批充分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后,可能会转型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哲理性表达,或者对民族文化的追寻;在专注于家庭情感伦理描写之后就转型为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关注;在从事创作的同时,也转型为一种“学术性的文学”表达。他们大部分人都经历了文学的“三级连跳”,他们没有“从一而终”,而是表现出个人在文学创作上最大可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今天,我们还难以对晋军作家做最后的论定。事实上,晋军作家直到目前仍然处于“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即使我们探讨20世纪80年代晋军作家的作品,似乎也只能就事说事,而无法轻下结论。一方面,对他们的创作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和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保持着澎湃的创作活力,正在不断推出自己的新作。那么,就让时间来检验一切吧!

2016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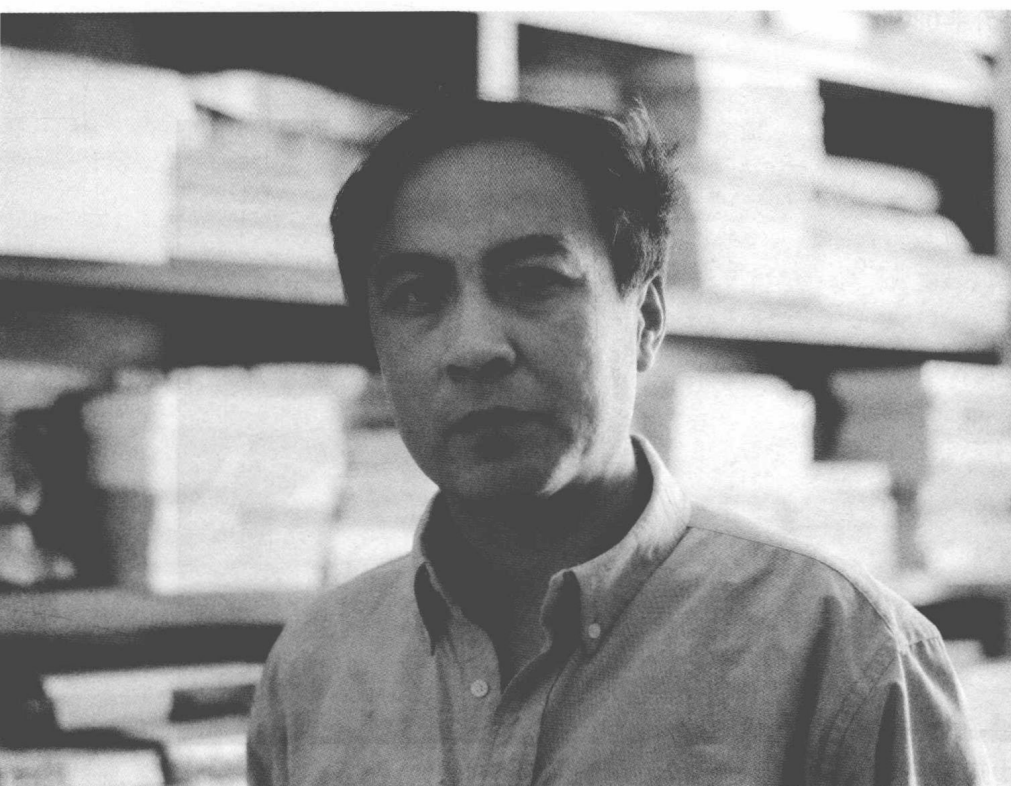
吕新小传

吕新,生于1963年,山西左云人。早年在雁北地区做过多种工作,1990年代调到晋中文联工作,曾任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专业作家。

1986年开始发表小说。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主要写作短篇小说,代表作品有《那是个幽幽的湖》《瓦楞上的青草》《农眼》《圆寂的天》《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山中白马》《葵花》《夜晚的顺序》等。1990年代中后期以中长篇小说写作为主,代表作品有《发现》《南方遗事》《中国屏风》《绸缎似的村庄》《一个秋天的晚上》《抚摸》《光线》《梅雨》《草青》等。21世纪初至今,仍以中长篇小说写作为主,兼有部分短篇小说,代表作品有《石灰窑》《翩翩》《深红的农事》《米黄色的朱红》《瓦蓝》《我理解的青苔》《十月》《我们》《鱼鳞天:轻轻地说》《王家峪》《我把十八年前的那场鹅毛大雪想出来了》《木蝴蝶》《一天》《哑嗓子》《白杨木的春天》《成为往事》《阮郎归》《掩面》《下弦月》等。

《白杨木的春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影像资料





1980年代作者在北方某地



作者于1980年代的某年春天